

根据持久人民革命战争的理论修正过去的经验、总结当前的经验的必要性

《（新）意共之声》第 18 期文章

托尼亚·N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尼古拉·P 在《（新）意共之声》第 14 期中的《政治斗争和辩护斗争》一文引发了一场辩论，随后是埃内斯托·V（《（新）意共之声第 15 期》）的《革命政治》，罗萨·L（《（新）意共之声》第 16 期）的《关于革命政治的第二战线》和翁贝托·C（《（新）意共之声》第 17 期）《区分持久人民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必要性》。这场辩论给出了对单个国家和全世界总体范围内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总体看法，它表明了我们必须自觉地跟紧第二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是我国的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我在此补充一些评价，相信这会帮助我们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这次辩论的内容及其重要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辨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出发，从每一门科学的内容和具体规律中提取出来的原理和一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促使共产主义发展所根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即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的性质、矛盾、规律和方法，指导共产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是工人阶级为指导当代社会的前进方向，为引导其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为把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人类从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的经验的结晶。[\[1\]](#)社会主义科学同每一门科学一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天生的知识，也不是个别天才的成果。共产党人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探索，直到他们找到了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规律和原则。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家经过验证、错误和校正所建构的科学。迄今为止，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列宁（1870-1924）、斯大林（1879-1953）、毛泽东（1893-1976）一直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阐述者。

社会主义的一个论断是：如果从它的全过程来考虑的话，从开始到胜利，从第一批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形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行（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阶段开始，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向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由于构成其本质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它的发展和支配它的规律及它的实施方法，它更像是一种军事行动（说成是战争更好），而不是选举运动、资产阶级政权中的两党斗争，或工会斗争、商业谈判等。

这是我们对《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近16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思考得出的结论。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军事理论、军事艺术和科学，给出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们都做到了。

共产党对军事理论兴趣的缺乏几乎就是党没正确发挥自己的作用的标志。这与党在该阶段是否有自己的武装组织的事实无关。这场战争不是，有时候不主要是武器的问题。它是人类群体（家庭、部落、民族、阶级）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对抗。

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阶级之间的战争：工人阶级要引导其他群众（只有解放全人类，工人阶级才能将自身从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维护多年前从贵族和神职人员那夺取的权力。

工人阶级可通过资产阶级的消亡结束阶级战争，而资产阶级却无法通过消灭工人阶级来结束阶级战争。资产阶级靠剥削工人阶级为生，他们离不开工人阶级，所以他们不断地改造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能重创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性的力量来迫使工人阶级休战。这种休战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工人中有组织力量所犯的错误的达成的。斗争中既有国家层面的战争过程，也有全球性的战争过程。这两个运动是分开的，但它们会相互影响。

人民革命战争是这场特殊战争的科学。这是毛泽东充分阐述过的，但毛的理论针对的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今天，我们既要把它阐述成意大利共产党人对我国

的看法，又要把它描述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理论。就像每一门科学一样，它是对过去经验精细化的结果，当经验和其自身的平衡共同发展时，它变得越来越丰富。对于这一结论的检验使得过去看似偶然和不连贯的经验的所有要素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同时使得它能更好地指引我们的工作。

根据共产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所总结的经验，如今我们知道了：工人阶级将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一场持久人民革命战争，直至胜利。

让我们看看过去的经验。

一旦共产党向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任何类型的社会改革者阐明——工人必须掌控社会的政治方向以便在市民生活中（行业、对比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资产阶级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2\]](#)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政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各不相同且各有分歧的答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不断斗争以及路线的不断分裂的现象不断出现。随着经验的进步和经验的平衡，共产主义运动给出了的正确答案也越来越多。

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说工人阶级将夺取政权或直接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两个论点之间的区别是在巴黎公社后总结出的经验基础上变得清晰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解释了这点，在人民起义中：共产党人会把夺取政权作为人民起义的更高指标。

而在1895年，当马克思的小册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重新出版时，恩格斯明确地对这一答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断言，只有革命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过一个阶段的积累后，工人阶级才能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政权。

他指出，这种革命力量是在第二国际所做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模范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促进了许多类

别的协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文化和体育组织，合作社等），并积极吸收工人开展思想工作、思想政治训练和政治组织工作。它在议会上的力量在一次次的选举中壮大起来。这是革命力量的积累。恩格斯知道通过议会的道路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当资产阶级在议会和大选中陷入困境时，资产阶级会把它们搞得一团糟。然而，恩格斯将夺取政权推迟到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迟早要破坏自身合法性做出模糊的反应。但是，恩格斯一再拒绝“不惜一切代价合法化”的主张，这不仅与行为和实际行动有关，而且与党的宣传有关。

1891年（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制定埃尔福特纲领），恩格斯主动发表了马克思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但马克思所指导的社民党领导人考虑到德国的严酷法律而隐瞒了对合法化的顾虑。

工人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即资产阶级社会衰落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的时代，这个问题以一种更为广泛和紧迫的形式，推到了共产主义者面前。共产主义运动需要一个更先进、更正确、更清楚的答案。

二十世纪初没有自问这个问题的领导人和党是落后的、耽于幻想的、肤浅的领导人和党。他们避开了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紧迫而决定性的问题，他们火烧眉毛了还在讨论无关紧要的问题。除了列宁领导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外，连第二国际也是如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这次战争为战争的更高级阶段（今天，我们应该说，他们必须从战略防御阶段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创造了必须动用所积累的兵力的条件，几乎第二国际的所有党派都没有表现出有应付这种局势的能力。他们退却了。他们积蓄力量时没有考虑到战争的下一阶段、没有足够正确的战略方向。他们的力量不足以进入下一阶段。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右翼最终都是被资产阶级所摆布。左翼也必须撤退到了必须从革命力量积累的阶段重新开始的位置。在许多国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都因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和政党的肤浅幼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不过一些领导人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试图从经验中得到答案。

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右翼分子回答说：工人可以通过参加他的政党或加入其他资产阶级议会中的政党，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来夺取政权，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大众有利。

他们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是按资产阶级的标准建立的政府，他们断言这是人人享有的民主。他们更不愿意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完全停止了存在，并把政府留给了军国主义（正如过去常说的那样），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预防性反革命。他们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的回答，映射了第二国际大部分政党的真实路线，特别是德国社民党。

正是因为他否认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变化，卡尔·考茨基（1854-1938）也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他断言（参见《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德国社民党要想通过选举和议会的方式夺取政权，“除非资产阶级没有破坏它的合法性”。

可能性很大的是，考茨基 1909 年保留了意见，他没有直接将其提出防止资产阶级主动破坏其合法性的措施；而在 1914 年，社会主义者抗拒这一制度的要求的情况到处都是。

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德国社民党的权威领袖，站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对立面。

早在 1900 年，她在第二国际的巴黎会议上发表演讲，卢森堡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场广泛的经济危机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结束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巨大失败。现在看来，这种假设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地，世界范围的政治动荡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的情况更有可能”。很明显，罗莎·卢森堡相信资本主义的终结将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尽管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明显不同，但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体系使得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世界统一已经实现。因此，她排除了工人阶级一开始就在一个或多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排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胜利国家的逐步发展才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后来，罗莎·卢森堡考虑到她本人参加过的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至1907年）的经历，再次得出了她的答案。她坚持（见她写的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工人阶级将通过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罢工不仅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成员进行的，广大群众也会被带入这场运动中）。卢森堡试图借鉴这一经历，但她却从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她认识到，德国社民党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但她的解决方案是号召群众自发的主动性，而不是通过斗争形成一个党来履行职责，以此积累足够大的力量进入战争的下一阶段。她断言，“群众罢工，政治上的大规模斗争……[他们只能来自]……革命阶级真正的坚定的行动，她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胜利并领导广大群众，这些人没有组织，只有革命的意识。”面对由此产生的“意识”问题，她回答说：这是群众直接革命行动的简单结果。简而言之：革命是革命群众创造的，革命群众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他们革命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罗莎卢森堡承认：“革命阶级的真正而坚定的行动”将庞大的无组织的群众引自己的道路上，那就不完全是群众自己的行动，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引导的，她应该对德国社民党自身提出异议并承认列宁对共产党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想法是正确的。

此外，她还必须承认，对于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及群众来说，各国的准备都是不一样的，仅就这一事实而言，夺取政权就不会是所有国家同时进行的。

列宁根据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权衡了卢森堡的这个声明，但列宁坚持认为，“革命阶级真正的坚定的行动”带动了数量众多但没有组织的群众。这样一个行动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组织的一方完成的，而他们必须形成一个组织才能开展活动。革命力量的积累正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一有组织的部分的结合和形成的时候进行的。他们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带领其他群众进行革命，建立新的政权。总之，革命力量的积累，是指建设与革命任务相适应的共产党，是指建设已经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党的群众组织。不过列宁一开始认为这是俄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不知道这是普遍规律。直到1914年后，在第二国际的一些人背叛革命，另一些则对此无能为力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项普遍规律。（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4）和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

至于俄国，列宁断言，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将通过建立工农革命代表会议来夺取政权，因为工农革命代表会议是第一个属于工人农民的反抗沙皇政权的组织。列宁很好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他逐渐地从革命中开始学习。列宁在二月革命以后和战略平衡阶段中找到了适合俄国革命性质的解决办法。后来他意识到，一方面，西方的无产阶级无法帮助俄国革命，但另一方面，政治危机又使资产阶级不能对俄国的反革命进行决定性的帮助，而当时革命进攻的条件只限于俄国领土。斯大林就是这样跟着他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第一个国家中建立了，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五年间，他积累了大量的面对问题的经历和自行解决问题的经验。俄罗斯胜利了，但在世界范围内，革命战略平衡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苏联有领土基础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世界范围内，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相互对峙，没有一个能够消灭另一个。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通过共产国际所做的工作和它下属的党，革命力量不断增强，最终取得了优势。

1957年11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召集了76个国家的共产党——其中有12个是执政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权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成、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各殖民地国家目前的革命，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力量，然后他宣布：“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见毛泽东《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馆机关干部上的讲话》）共产主义运动要继续下去，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动进攻。

但是修正主义者已经在苏共等一些共产党获得了权力，所以他们不想与这个观点发生任何关系。尽管以中共为首的许多共产党进行了斗争，但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开始放慢了前进的步伐，然后开始衰落。这证明了不向前迈进就意味着后退。二战抵抗运动胜利后，意大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如今，在更高阶段，我们又要重新经历革命力量的积累期的一切。除此之外，这种高级阶段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权衡了过去的经验，并从经验中吸取了更深远的教训，我们的领导大大扩充了我们所积累的力量，而那些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丧失了这些力量——不管他们意识到与否。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没有党领导的革命计划，因为它注定要失败。

今天，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没有动员人民群众的革命计划。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将经历许多阶段。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在短期内夺取政权的计划，不过在每个阶段，只要必要的条件足够，我们就要做好进入下一阶段的准备；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手段去创造必要的条件。人民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的发现，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

此外，我们关注的是对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特定规律的发现和这场光荣战争的实际条件，一步接一步、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直到社会主义建立。

注释：

[1]在“改善群众的物质，道德和知识条件”和“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从服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消灭阶级分化”中，有本质和政治上的区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就逐步地把共产主义运动从为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而斗争的运动转变为了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道德和智力条件而斗争的运动。

一般来说，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享受着非常好的生活条件，一个慷慨仁慈的主人的奴隶也是如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得到了解放。他们分别依赖于父母和主人。这些例子体现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与解放之间的质的区别。

在苏联，托洛茨基在某一时候反对工人的生活比商人、富农等更糟的现象的出现。列宁和斯大林反对这一观点。他们指出，关键是苏维埃工人当权，因为这个，他们决定使一些阶级和阶层服从自己的目的和方向，同时给他们特殊的生活条件和收入。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也直接攻击了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1918-1923年的著作中有着充分的思考。

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伙再次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念：重要的不是解放，而是生活条件；而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工人的生活状况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

[2]这两种提法（“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个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地是“夺取资产阶级的国家，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二个，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地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把资产阶级国家一扫而光”。这种差异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和解决，从而支持了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在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浪潮的经验在实践上做出的第二个回答。即使工人阶级偶然地或在各种情况下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也不适合作为人民群众摆脱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差别的工具。因此，帝国、教皇或封建的政权不能作为扩大和巩固商业贸易、个人自由和资产阶级平等的工具。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大，但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这些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下，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都有少数人压迫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组织。